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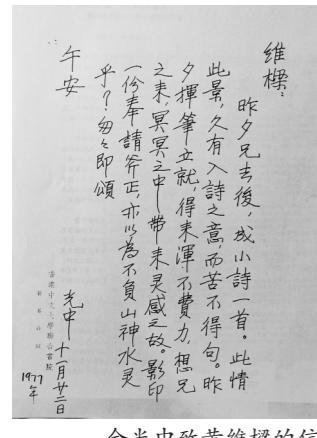


那些肆读、细读的时光……

□黄维樑

[书房简介]

我的书房有两个，香港的书房称“若衡文库”，深圳的书房称“书厅”。书厅有V字形书架，其后为书桌、电脑桌等，是我的工作间。我非藏书家，书是积累堆叠起来的，书的增加、滋长有如热带雨林。我爱书房里所有的书、报刊、文稿、信件，但这些迟早将离我而去。



余光中致黄维樑的信

数十年来读书，除了中学时期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外，我主要读人文学科的图书，特别是文学的。读得杂，但杂中有序，有重心。

中学时期蒙昧昧昧，家里和学校图书馆有什么书，我就挑什么书来读。1965到1969年读大学，是我的启蒙时期。上《文心雕龙》课，1500年前典雅的文辞，一读惊美倾心，此书成为我日后治“龙学”的基础。课外读余光中，文星版黄皮书1963年的《掌上雨》，1964年的《左手的缪思》、1965年的《逍遥游》，文章瑰丽博雅不可方物，此三书为我日后的“余学”奠基。读香港作家徐速的爱情小说《星星·月亮·太阳》，发表长文评论之，此书成为我日后研究香港文学的引路之光。

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校园小，图书馆却相当大气。我课余浏览中典西籍，对杂志兴趣浓郁：《明报月刊》等中文杂志之外，《巴黎评论》(Paris Review)和《文汇》(Encounter)等肆意翻阅。我主修中文，副修英文。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达史》——此书为台湾翻印，原书名中“发展”被改成“发达”，以及两千多页圣经纸精印精装的《诺顿版英国文学选集》(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)分别是中英文系的指定教材。中西兼顾，使得我日后的文学研究和评论，常带有比较文学色彩。

1971至1976年，我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立大学深造，文学理论为我主要用心用力之所在。陈颖教授和Prof James Battersby都专精于

此，论文导师陈颖先生对古典诗词简直倒背如流。两位老师都让我得益匪浅。俄大图书馆高十多层，考试期间馆内提供免费咖啡，学子品牛吞，为使脑细胞保持活跃。馆藏东方书籍若干万册，我读博期间，天天泡馆，沉浸在中西典籍之中。我的博论题目定为“中国诗话词的印象式批评”，论述时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。馆藏的古今诗话词数量可观，我浏览了个遍，从中抽样选择诗话14种、词话7种，作为析论的对象。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非常关心我的学业（我差一点成为他的学生），我告诉他准备怎样写博论，他回信说：“不要自讨苦吃，选择一两种诗话、词话来做不就行吗？”我还是照原来构想苦干一番。

我通过中西比较来说明中国诗话词批评手法的特点，西方的文论自然要尽可能阅读。图书馆里有的是永远看不完的相关书籍，我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，看到20世纪如艾略特、韦勒克、弗莱等人的著作，不亦苦乎，也不亦乐乎。图书馆影印方便，不像钱钟书在牛津大学“饱蠹楼”(Bodleian Library)那样要勤抄笔记。我不懂拉丁文，更不会希腊文、亚里士多德和朗杰纳斯等人的高论，只能阅读英文翻译。

1976年夏天，我取得文学博士学位，马上回到香港的母校教书。教学相长，教什么就要备什么课。在香港，我所教以现代文学为主，阅读自然离不开“鲁郭茅巴老曹”诸人名作，徐志摩、闻一多、卞之琳以来的新诗，



黄维樑，香港中文大学学士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及海内外多所大学教授；著述从首部《中国诗学纵横论》至今年的《香港文学通论》，共三十余种。

还有钱锺书的《围城》。身为香港人，我同样关注香港文学，将阅读和评论的结果，结集推出1985年的《香港文学初探》。我的阅读仍然杂，但与教学和研究的主体保持着密切关系。阅读一向是我的乐趣。在香港，教学之外，各种学校内外的文化活动催人而来、逼人而来，我常常觉得开卷肆读、细读的时间不够，十分怀念俄大图书馆宁静畅读的岁月。

到了21世纪初，我在台湾的佛光大学教书，肆读、细读的时光仿佛倒流而来。佛光大学校园之东是太平洋，古今中外的典籍浩瀚如海如洋。我沉浸于阅读、研究、写作，出

版。2014年的《壮丽：余光中论》、2016年的《文心雕龙：体系与应用》，两本书的很多篇章就是在佛光普照中完成的。

时光跳接到最近。我受邀7月在内地一高校开设一个暑期“微课程”，名为“西方文学经典选讲”。目前备课，重读《俄狄浦斯王》《哈姆雷特》等等经典，依旧趣味盎然，收获沛然，十分“享受”。近月，一直在重读旧的拙作、新的拙作，为了要编集出书，或者为了交稿前的“品质控制”，也有“自珍”的因素在。得闲也许就此事写一篇《黄维樑读黄维樑》，作为我阅读史的附记。

[书道]

要精读的书为何，可略读的书为何，因人而异。我精读的书，必在篇页划线显示要点，必加注、加批表示心得或疑难。用蓝色笔、黑色笔写字，用红铅笔划线，用淡黄色或淡绿色把佳句、特句涂上色泽。这样，篇篇页面都瑰丽多彩。

[书语]

我阅读，我享受人生。

[近读]

李平：《黄侃〈文心雕龙札记〉研究》(中华书局)

季进：《钱锺书与现代西学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张向东：《新名词、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》(商务印书馆)

叶琼琼：《隐喻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》(武汉大学出版社)

徐强：《人间送小温——汪曾祺年谱》(广陵书社)

[自荐]

黄维樑：《中国诗学纵横论》(1977年台北洪范书店)



1977年出版，论诗话、词话，论《人间词话》，论言外之意。印了五次。



街市里的斯宾诺莎

与斯宾诺莎的相遇纯属偶然。

在阿姆斯特丹无目的地漫游，走过一条又一条运河，过了许多座桥，天色从夕阳转向夜的幽蓝。在一条小运河、一座桥与街市连接的地方，突然看到近代西方哲学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巴鲁赫·斯宾诺莎的雕塑。这是靠近滑铁卢广场的一个角落，斯宾诺莎成长与早期活动的地方。

与其说这是斯宾诺莎的雕塑，不如说是一座纪念碑，高大和庄严。斯宾诺莎身着长袍，看起来是年轻时候的样子，在他的左侧，有一个多面体棱镜，仿佛是提醒他用几何学方式推倒伦理与政治自由的原理，相信万物皆有灵，以及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纪念碑底座上环绕一圈写着他的名言：国家之所以成立的目的就是人的自由。

停步脚仰看斯宾诺莎的此刻，阿姆斯特丹亮起了灯，渐渐沉入夜色中，泛着黄色的光，这时可以看到他的长袍上都是花与鸟的装饰。斯宾诺莎虽然在世时活得辛苦，死后长久遭到忽视，但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曾经给英国女作家乔治·艾略特以启发，在二十世纪末启迪了哲学家德勒兹。

这时，听到街市的声音，我想到犹太作家辛格的《市场街的斯宾诺莎》：老拉比最终在人生的愉悦中，理解了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，他仰望天空，看到宇宙的壮丽，万物的历史，无限的时空。



关于帝王蟹的争议

南京大学食堂里的帝王蟹引发争议，太正常了！不正常的是，把正常争议上升为“敌情”，让社会包容的阈值越来越低，观念带宽越来越窄。还好，南京大学食堂里出现999元的帝王蟹，无论是特殊的商品，还是特别的价格，注定会引起讨论和争议。

大学食堂是把帝王蟹当成宣传点，也就是希望能成为引人注目的“营销点”“传播点”“新闻点”——什么叫新闻？狗咬人不是新闻，人咬狗才叫新闻，不同、反常、特殊才容易成为新闻，这注定了那些容易成为新闻的事件包含着一定的冲突性、争议性、讨论性。当把999元的帝王蟹写在食堂菜单里，应该预见到可能的争议性。

每个人的站位不一样，对这只999元的帝王蟹判断必然就不一样。帝王蟹这个“事实”，有无限多的“阐释角度”，尼采说，没有事实，只有角度。——不同角度的折射中，有的学生看到的是“学校体贴学生”“花样宠学生”，食堂表达的是“食堂提供的多元选择”“平价之外的特殊选择”，有的网民质疑的是“是否悖离大学食堂的公共属性”，有的教育者担心的是“是否会引发消费攀比”。比较参照系也迥异，有的看到的是“比外面的帝王蟹价格低多了”，有的看到的“比学生的日常消费高多了”是我过去一个月的生活费了”。

这就是角度，每一个角度都有其合理性，关于999元的帝王蟹，这不是对与错、是与非、事实与谣言、真理与谬误的交锋，而是不同站位和认知下“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”的冲突。保持开放、自信与对话，保持对彼此合理性的尊重，让那根“敌情”的神经松弛下来。



难缠的游客

到撒哈拉大沙漠旅行，旅程异常艰辛。一路颠簸风沙中，导游迈赫迪聊起他多年来接待过的游客，感慨万千地指出：“游客的素质参差不齐，有的通情达理，很好相处；有的却任性难缠，令人哭笑不得。”

他举了几个难忘的例子。

有一位美国游客，进入沙漠腹地后，一天到晚嚷着要吃香蕉。迈赫迪苦笑道：“这就好像叫我去沙漠找个喷泉给他观赏，一样难过！”那名游客不依不饶，一再坚持地说：“只要你肯找，一定能找到！”在寸草不生的沙漠，迈赫迪为这事愁白了三千烦恼丝。最终，那位游客在反馈表上写上“服务不佳”的差评，让他白白受了委屈。

又有一位意大利游客，到了午餐时间，看见迈赫迪所准备的长棍面包、熟鸡蛋和奶酪，皱着眉头抱怨：“我想吃意大利馅饼。”迈赫迪摊手叹气：“就算我是魔术师，也没有办法在这漫天黄沙的地方变出一个馅饼呀！”

还有一对英国夫妇，行至荒漠深处，妻子忽然内急，坚持要迈赫迪带她去“公共厕所”。在横无际涯的大漠，哪来的公共厕所啊？

迈赫迪叹道：“平生第一次远行，对异国的风土人情一无所知，却仍旧执着于原本的生活方式。结果，既苦了自己，也为难了别人！”



李叔同与贝多芬

李叔同是中国近代杰出的佛学家、美术教育家、戏剧活动家；贝多芬是德国伟大的作曲家，有西方古典音乐“乐圣”的美誉。贝多芬逝世五十三年之后，李叔同出生，两人之间会有什么瓜葛吗？

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，正是李叔同。1906年2月，时年26岁的李叔同，在日本以“出版部公益社”的名义编印了《音乐小杂志》第一期。这个刊物部分被运回上海发行。正是在该刊上，李叔同以“息霜”为笔名，发表了他据日本石仓小三郎《西洋音乐史》“删窜成之”的《乐圣比独芬Beethoven传》。

在短短六百余字篇幅中，李叔同介绍了贝多芬的生平、音乐创作的分期和他的代表作。他认为贝多芬“天性诚笃，思想精邃”，其音乐创作“心力真挚，结构完美”；贝多芬的众多作品中，钢琴奏鸣曲“殆称绝技”，而九部交响曲也“为世传诵”。

本周，我到温州大学讲“贝多芬与中国现代作家”。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后，于1921年到温州定居长达十二年之久。他在温州完成了重要的佛学著述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，参编了《护生画集》《清凉歌集》。温州，是李叔同佛学思想和宗教艺术实践的成熟地。

因而，有机会在李叔同长期生活过的温州，追述李叔同与贝多芬的这段鲜为人知的因缘，真是一次难得的奇妙的体验。



重新解释“当代文学”
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是讲稿，但洪子诚之作，一向有讲稿胜于专著的美名。不止一人讲过，香港版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胜于后来用作全国大学教材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盖讲稿更便于讲者自由发挥，更利于单刀直入问题。简单说，讲稿更见出讲者性情，也更见出讲者功力。

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从1949年论及上世纪80年代，正是洪子诚用力最深的阶段，也是他亲身经历的阶段。换句话说，个人的成长与历史的成长同步。洪子诚一直在高校读书、教书，不曾身列工、农、兵行列，在某种意义上避免了知识特权和信息茧房的干扰，这给了他更好地观察文学史的角度。

洪子诚在第一讲里讨论《疑窦丛生的“当代文学”》，提出“现代文学”替代“新文学”，是为“当代文学”的生成给出空间。或者说，是“当代文学”创造了“现代文学”。这个说法比较拗口，却反映了作者的洞见：“新文学”是一种性质的界定，而“现代文学”则兼性质和时段而有之。“当代文学”明确了现代文学的下限，也将“现代文学”的性质标示了出来。

洪子诚说，“当代文学”就是“国家文学”，这一定义很好地阐释了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提出的“一体化”概念。事实上，这是统摄全书的观念，后面的十五讲，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理解。



相思湖畔

蛰伏数月，出门去南方的南方，广西南宁。每次来差不多都是节气上的冬季，而满目的热带树木却郁郁葱葱，永远繁茂。“相思湖”是一个人工湖，与邕江紧紧相邻，湖畔深色浅色的绿幕里，生长着灌木和乔木，点缀着红花和红果。湖里游弋着一些野鸭。每逢漫步，那些美丽的诗句，想必会隔空回响。

这次是参加广西民族大学第二十二届“相思湖”文学奖的颁奖典礼。台上一等奖的获得者正热切阐释她的文学理念，她的写作。于是我想，文学的光芒，很难简单描绘，但有一点是，文学拥抱生活，又拓展了生命，说不清人生的哪一个至暗时刻，她会点亮你的灵魂，让你与世界发生勾连。

早年，看到过一段话，说古希腊那些比例优越、外形俊美的雕塑，是想留住一个人十八岁到二十一岁的美好青春。其实，青春不只是生命的一段时光，更是心灵上的一种流动状态。来自每一个学生求知的本能和内敛于心的尊贵，才是一切美丽的来源。

文学会迭代，但文学更是需要长期主义，需要坚持的事业。唯有热爱，才能坚定内心，让文学的路，走得更远。无论何时，我们读到的那些触动人心的文字，给生命提供本质的诠释，它们顽强地穿透具体的黯淡，成为虚空中那颗灵魂最耀眼的标注。这是人类精神层面永恒的寻求。



●随手拍
图文周宗毅

夜幕降临，天河体育场灯火通明，锻炼者在跑道上挥洒汗水。不远处巨幅屏幕循环播放着全运会的宣传片，点亮广州的夜空。

随手拍专用邮箱：
ywcwbyb@163.com